

天津社会科学丛刊第三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天津工人运动记事

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合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天津工人运动记事

(1919年——1949年)

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合编

天津社会科学丛刊编辑部出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记事

(1919年——1949年)

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合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天津社会科学丛刊编辑部 出版

期刊登记证号：(津) 176 号

定 价 1.80元



海 鷗 表

中
国
计
时
之
宝



天津手表厂生产的海鸥表系列产品，
有男式、女式表，日历、自动日历、石英
电子表等，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
和喜爱。



天津手表厂工会，
组织职工开展丰富多采
的文体活动，大大促进
了两个文明建设。



编 者 的 话

在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60周年之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记事》和读者见面了。

近代天津是我国著名的沿海工商业港口大城市。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在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天津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辑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的史料，歌颂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提供革命传统教育的素材，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开始进行天津工运史资料的搜集工作，于1982至1983年间，编写出《天津工人运动大事记》草本，内部征求意见。在有关领导和工会组织的建议下，1984至1985年又由原编者将“大事记”作了补充修订，编成现在的《天津工人运动记事》一书。这本书共四个部分：“五四”、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董振修执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姚洪卓执笔；抗日战争时期由李劲燧执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乔多福、王学海执笔，全书由李劲燧、董振修统修。

本书主要根据报刊、档案、书籍等文字资料编成，同时也参阅了调查访问资料，我们还吸收了别人的研究成果。由于天津工运史是个新课题，缺乏专题研究，如某些罢工中的地下党的领导者尚未弄清；黄色工会问题比较复杂等等。这些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挖掘资料，进行研究，加以解决。有些条目的处理也未必妥当，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在观点与取材上不当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同志们惠予指正，使它不断完善。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本市及外地许多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目 录

“五四”、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19—1927年)	(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8—1937年)	(73)
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年)	(188)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5—1949年)	(223)

“五四”、建党和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19——1927年)

一九一九年

五 月

四 日 为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全部权益转交日本，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主义外交，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并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天津学生从5月5日起，发表通电，建立组织，开展示威、讲演、请愿等斗争活动，积极投入运动。

八 日 两个工人在马路一家元宵铺吃点心时，气愤地谈论日本强占我国山东问题，都主张天津效法北京，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并立志不买日货。次日，天津《益世报》就此发表《评贫苦者爱国》的评论，赞扬这两位工人，指出：“其富贵程度越高，爱国心亦越薄弱，而极贫极贱之人，其爱国心反极真诚、极热烈。”

二十五日 现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讲演员在北大关讲演“青岛与中国的关系”和“必须抵制日货”问题时，一位三十岁左右姓张的人力车夫，为表示爱国之心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当场捐助铜元20枚，说“我等劳力之人，但愿中国不亡，多出些

气力何妨！”在场者众口一词，莫不称赞。

三十一日 天津《益世报》报道，天津海关全体码头工人就抵制日货问题开会作出决定：“此后如再有日货进口船只抵埠时，无论其出若干代价，不许为之雇用卸载，如有违背者，从重议罚。”

六 月

十 日 天津商界罢市，数十万劳动群众酝酿开展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天津总商会”当晚急电北京政府，称：“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津埠商民处此水深火热，已有不可终日之势。……请急以明令并惩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得电后召开国会紧急会议，星夜派人来津，于总商会宣读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各职的命令。

同 日 天津全体人力车夫举行罢工。

十八日 天津绅、商、学、教、报各界代表61人在总商会开会，通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章程，选举卞月庭为会长，马千里、刘俊卿为副会长，宣告“天津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该会宗旨是：“拥护公理，发展民权，提醒国民爱国思想，督促实业，主各机关兴办实业，振兴国货，关于内政外交随时觉察，负陈请建议政府之责。”各界联合会下设评议部、总务部、文牍科、交际科、调查科、会计科、庶务科、演说科等部门办公。

二十日 为“抵制日线，提倡本国线”，织布工人拒绝使用日本合股洋线。是日成立“天津织布艺人罢工团”，并举行罢工。工人们认为：“做工者虽皆是寒家，指着手艺吃饭，然亦不能轻易开工，饿死我们工人是小事，亡国后四万万同胞与外人作奴

康是重大事。工厂如用日线，我们死不开工。”

二十七日 天津、北京各界代表一起在北京新华门向总统徐世昌请愿，坚决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要求拒签“凡尔赛条约”。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天津各界请愿代表的连日斗争，28日徐世昌当场拟文，致电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签和约。天津各界在实现拒签和约后，亦纷纷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望其“坚持到底”。

七 月

四 日 因法国永和公司下属新河船厂发生鼠疫，职工死亡达百余人，法国资本家竟若无其事，引起工人的愤慨。同时该厂木工刘三因在厂内苇地大便，被法国协理罗贝看见，先遭痛打，后被开除，激起两千多工人的公愤。工人遂发动罢工表示抗议，提出四项条件，协理被迫全部接受，6日复工。

五 日 停泊在法租界码头的日本轮船“万世丸”船员殴打中国搬运工人，激起公愤，群起反抗。

六 日 “各界联合会”公教救国讲演团18人，于下午4时半，在旱桥外北四区门首和南竹林村北口外大马路讲演，作反帝爱国宣传，听者共一千多人，“劳动界居大多数”，秩序井然，

“无论男妇，其一种乐闻不倦及被感动之气象，形容于外，有不能以言语喻者”。由于劳动群众踊跃听讲，至晚9时方散。

十一日 《南开日刊》透露：为“调查奸商，维持国货”，法租界成立“苦力联合会”，会员已有三百多人，马玉明任会长。

二十七日 《南开日刊》据“北方通讯社”消息称，电车售票人员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对卖报的学生实行免费乘车，但电车公司比国资本家得知后，对售票人员“加以罚金”。因此，“群情大愤，一律同盟罢工”。

九 月

十六日 周恩来、郭隆真、马骏、邓颖超、刘清扬等20人（男女各半）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

“觉悟社”是“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革命团体之一，是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这个团体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所以取名为“觉悟社”。觉悟社组织严密，社员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社内组织采取委员制，不设社长、干事等职务，本着分工合作的精神，社内工作由全体社员分担。觉悟社通过它的刊物《觉悟》、通讯刊物《觉邮》传播马克思主义及革命思想。

十 月

十一日 天津各界几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国庆庆祝大会”。大会发表“双十节宣言”，指出：反动政府命令军警逮捕请愿代表，警察厅长杨以德逮捕演说学生，解散各界联合会，禁止印刷学生报纸，民权“完全剥夺”，“故今日吾国对于‘共和’二字，只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这一天，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出军警包围会场，企图阻止大会的进行和群众游行。童子军、男女学生不顾镇压，英勇搏斗，多人受伤，邓颖超亦“被伤吐血”。最后，群众冲破包围，举行示威游行。游行中许多讲演员向广大群众散发传单，作简明讲演。鉴于军警的镇压，示威游行临时改变路线，来到警察厅并将其包围。人们推举周恩来等四位代表面见杨以德，质问为何巡警无故殴人和阻拦庆祝“共和”？杨以德惧怕群众，托辞避而不见。示威群众坚持斗争，至次晨方散。11日，二千五百名学生讲演员在东马路、西马路、北马路、南马路上向群众宣讲，抗议军警暴行。

十 一 月

一 日 天津“真学会”出版的通俗进步刊物《新生命》创刊号发表了署名柏生的《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一文，文章写道：“近来劳动界都已觉悟了，所以每次罢工都是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价。劳动界的痛苦虽比从前减少些，但并不是根本的解决。什么是根本的解决呢？有俄国为先例……俄国的劳动者实为推翻俄国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先锋……”

〔注〕《新生命》系半月刊，先后共出四期，第4期出版时间是1920年12月15日。该刊重视劳动问题，指出劳动者要驱逐贫困，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就必须以苏俄人民为榜样，和剥削阶级作彻底的不妥协的政治斗争，仅开展经济斗争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十 二 月

十五日 天津《益世报》报道：“救国十人团近来加入新团甚为踊跃，除有女界爱国同志会外，新加入者二十余团。油漆、扎彩工人刻已组织一百余团，不日即行加入，表示一致行动。”这说明工人是“救国十人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救国十人团”是“五四”时期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兴起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的群众团体，其成员有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店员等。它每十人为一团，推一团代表，每十团推一代表称十代表，百团称百代表，千团称千代表或某处第几千代表。该团宗旨是：“抵制日货，储金办实业”。天津“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于1919年6月28日在西门里福音堂成立，其成员很多是基督教中的爱国人士。11月24日，《天津救国十人团报》创刊。在“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二十日 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枪杀福州学生的

罪行，为把抵制日货斗争坚持到底，天津各界群众十余万人在南开操场召开国民大会。大会发表了《天津国民大会宣言书》和散发了《国民大会特别传单》。各团体首领分别于中央演说台和四隅演说台上发表演说。大会当场焚烧一大批违章出售的日货。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一九二〇年

一月

二十九日 为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拘代表，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率领天津二十多所学校几千学生前往省公署请愿，求见直隶省长曹锐。反动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警，由军官持指挥刀在前率领，使用水龙、大棒、枪托、刺刀，血腥镇压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卧地不能起立者数十人，头破血流、腰折腿断者十数人，眼部刺伤，头顶穿透，腰臂手腕被击脱节者又十余人”，演成“九一八九”（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惨案。在惨案中，周恩来等四人被捕，连同此前被关押的代表共24人。他们在监狱中继续进行斗争。

五月

一日 被捕的各界代表早起分室大扫除，以实际行动纪念“国际劳动节”。

二十八日 从是日起至6月7日，周恩来分五次向监狱中全体难友宣讲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是：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

集中说》。

六 月

五 日 唐山开滦煤矿二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全矿停产6天。资方被迫允诺：工资一元至十元者，加18%；十元至25元者，加13%；25元至40元者，按个人情形分别酌加。罢工取得胜利，11日复工。

十 月

月底（或11月初）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为书记，成员包括吴南如、胡维宪、谌小岑、陶某等知识分子和京奉铁路职员。这个团组织有团章，每周开会一次，彼此交流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研究如何深入群众，还讨论革命理论问题。团组织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介绍给群众，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之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在天津散发。团员们在天津、唐山等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1月，这个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终止。

一 九 二 一 年

一 月

四 日 由张太雷为书记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的工人报纸《来报》创刊。该报由谌小岑、胡维宪编辑，反映工人状况，报道工运的消息，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群众的斗争。该报不仅在天津出售，还寄到唐山、长辛店、南口的工人手

中。《来报》出版二十天左右，就遭法租界巡捕房查封。后迁出租界，重新用《津报》名义出版。

四 月

二十一日 上海机器工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之日写信给天津机器工人，信中写道：今后对于资本家“应积极图谋待遇的改善”，“至少应提几项起码的要求，运用有效力的手段，非达到目的不止”。这些要求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和设立学校、图书馆、医院等辅助事业。信中呼吁天津也和上海一样组织机器工会，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假如各地同业都联合起来了，还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呢？”“欧美各地的伙伴们，现在都已猛烈地向前运动去了，现在是劳动者统治世界的时候，我们赶快联合起来罢！”这封信刊在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散发的宣传品《工人的胜利》上。

五 月

一日 长辛店工人集会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天津工人代表前往参加。

七 月

二至五日 天津租界一千多洗衣工人鉴于铜元行市低落，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在南市四海茶楼聚会，决议“每一元工资加半元，并起誓保守他们底团体，不论受何种摧残，决不涣散”。同时，发表了《罢工宣言》。三义庄专给美国营盘洗衣的工人罢工，被美国人报告了特别一区警察当局，遭到镇压，工人李全、范寿德等被捕。罢工被镇压后，全体洗衣工人再次聚会，坚持“不增薪，不放人，决不做工”。罢工后的第三天——7月5日，经英领事调停，工人薪金每一元增加四角，被捕工人被释。

放。罢工的目的达到，工人次日复工。

八 日 上海《民国日报》发表题为《天津的社会》的通讯，通过介绍天津造币厂，反映天津工人劳动的状况。作者写道：“天津造币厂，工人约有三百余名，各个人浑身上下都是黑漆一般，他们望我们笑了，才看见他们的红嘴唇。屋里温度很高，工人身上的汗珠连续不断地往下流。我们穿过相距一丈上下的两个门，就觉得非常难过，那酷热的天气，刺鼻的臭味，在黑沉沉的屋里一阵一阵的向我们周身乱扑，逼得我们无腿也要走，无脚也要跑。我们在屋里几分钟都不能耐，那工人却时刻不能离开他（它），你看苦不苦？却还要低着愁死鬼的头，勤勤工作。一副将破的肉皮，一线将断的灵魂，真不如监狱的囚犯啊！”

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

八 月

十九日 北洋第一纺织公司由上海招来的男女工人一百多人，因对拖延开工日期不满，借参观机厂为名，打算举行暴动。事情暴露，为首的男工袁保龄、女工陈小宝等13人，以“扰乱秩序”罪名，被警厅逮捕关押。

三十一日 天津总商会为鞋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并酝酿罢工一事发布告示，禁止鞋工罢业。告示写道：“该工人等嗣后如果无故罢工，一经察觉，本会即当援案函请官厅究惩，合函公布周知，不得任意罢工。”

本 月 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

九 月

七 日 下午2时，被裕元纱厂辞退之河南彰德籍工人孟玉珍等20余人，各持砖块闯入工人科，要求算账，解决生活问题，遭到警察镇压。孟玉珍、王福林等15人被捕，送天津地方检察厅核办。

十一日 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安体诚、于树德创办了“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这是我党早期建立的工人学校之一。该校设在纬路四段12号（今黄纬路派出所），规定：“普通部招收识字工人，而授以工人常识、国文、数学、尺牍等；特别部分国文科、英语科、数学科，得由工人择修一科或数科”。学校有专任教员和辅助教员若干人，安体诚、于树德均亲自任教。参加该校学习的以恒源纱厂徒工为最多，也有北站的铁路工人，虽学校有学生四十余人，但与学校发生关系的工人达数百人之多。1922年，安体诚、于树德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党组织又派吴某来校任教。这样，学校直接在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活动，是当时我党团结教育工人，指挥工运的机关，有关工运的党团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教员们除为工人补习文化知识外，特别注意通过读报、个别谈话、讲故事、作报告等方式，通俗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意义，用无产阶级在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生动事例教育工人，启发、鼓舞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1922年夏天，恒源纱厂的资方一面限制徒工外出上学，一面报请警察当局取缔该校。学校因此被查封，许多人被捕。

十五日 天津《华北新闻》增刊《微明》发表署名苦力的评论：《为什么外国的工人们都组织工会呢？》。

二十日 西头文盛和、益德元、德昌永、盛德成等香店工人一百余人，“要求增加工价”，在西门外小道子会宾茶楼聚